

#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初探\*

刘海江

(贵州财经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4)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得以产生的方法论前提和基础。毛泽东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着重解决了三个问题:通过对认识和实践关系的分析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解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从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两个方面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性。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10)06-0034-05

**作者简介:**刘海江(1976-),男,湖南邵阳人,哲学博士,贵州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毛泽东思想作为第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其产生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而且具有理论自觉性。从理论自觉性的角度看,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着一个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作为其方法论基础。这一方法论基础不仅是毛泽东思想赖以产生的前提,而且对于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之际,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上个世纪 30、40 年代,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和“历史向何处去”的现实课题,亟需一种理论来指导中国社会走出现实困境。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其强烈的现实实践性成为了当时最有影响力与号召力的一种思想。但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却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当时党内存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倾向:教条主义者拒绝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只是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上的片言只语;

经验主义者则局限于片面的经验而忽视理论的重要性。这两种倾向特别是其中的教条主义倾向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为了克服这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实践论》一文中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认识和实践关系的全面阐释,提出了一种迥异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和认识论模式,从而在理论上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

首先,毛泽东区分了认识和实践,把认识看作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把实践看作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中介。这可以说是对五四运动以来西学东渐过程中的科学性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所作的一次全面总结。这种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在哲学上包含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区分。这是一种与中国传统哲学相关思想存在根本差异的主客二分、天人二分的思想。《实践论》的副标题就叫做“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就是要给中国的传统哲学范畴注入新的科学思想。由于中国传统哲学讲究天人合一,因而在知行关系上也讲究“知行统一”,并且力求把行统一于知,从而得出了“知易行难”的观点,认为我们知道如何做是容易的,但是把这种知识贯彻到行为中去则是困

\* 收稿日期:2010-09-15

难的。这种知不是西方哲学所讲的关于客体的知识,而是伦理的知识,是一种只有贯彻到我们的行为中才会有意义的知识。这种知识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是在生活中所获得的“应然”原则。所以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知和行虽然有区别的,但并不包含一种主客二分和天人分离的观点,没有产生出一种科学的认识论思想。科学的认识论把主体认识看作是对客体的客观反映,客体的区别构成主体认识的区别。客体是自然界,这种反映就形成自然科学知识;客体是人类社会,这种反映就形成社会科学知识。在认识自然界的过程中,实践是沟通主体和客体的桥梁,只有通过实践,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才能够展示在人类面前并为人类所认识;在认识人类社会的过程中,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人类实践的产物,人类的活动及其产物直接成为认识的对象,本体论和认识论具有直接的统一性。但不管如何,在科学的认识论中,都肯定了认识对象相对于主体的独立性和客观性,肯定了认识对象可以在实践中为主体所把握。

其次,毛泽东不仅区分了理论和实践,还指出了理论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一开始就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sup>[1](P282)</sup>按照毛泽东的看法,认识的产生、发展及其真理检验标准都在于实践。既然认识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那么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现实就面临着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现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先行于中国的革命而创立出来的;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所特有的现实,这种现实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创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直接土壤。也就是说,现在有一种理论和一种现实,理论产生于西方和东欧,现实则为中国社会所特有,两者并不具有原始的关联性。现在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既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有结论出发,也不能抛开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局限于中国的狭隘现实,而是必须把这两种原来并无联系的东西联系起来。如果不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则只有两种可能:或者简单地局限于自身的革命经验而缺乏系统有效的理论指导从而陷入经验主义;或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些具体结论为依据来指导中国革命从而走向教条主义。因此,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因此就有了紧迫性和必要性。

## 二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当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西方和东欧搬到中国之后,首先面临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僵硬对立。这种对立必然会导致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产生。而要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就必须扬弃两者之间的僵硬对立,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

会上,毛泽东根据当时现实斗争的需要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sup>[2](P534)</sup>。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面临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成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包含了一系列的结论,这些结论产生于欧洲的现实。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中国具体化,就必须打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僵硬的外表。另一个问题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与中国现实结合的问题。在打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成性之后,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紧密结合。这种结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产生出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个方面则是要让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人所熟悉和接受。这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只有两者都实现了,才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结合。能否解决这两个问题,关涉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可能的问题。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恰好是针对在两个问题的。首先,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作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该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sup>[2](P533)</sup>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些现成的结论,而且同时是一些普遍性的可以用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原理和方法。这些原理和方法不是直接告诉我们如何行动,而是给予了我们一种新的认识现实和分析现实的途径。运用这些原理分析现实所得出来的结论,可能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实的解释,也不同于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那里直接得来的结论,而只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野出发所获得的对于中国现实的一种新认识,这就是一种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打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僵硬外表而发现其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的方法论内核之后,我们也就获得了一种认识中国现实的新的工具,从而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但仅仅只有一种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不行,这种理论还必须实践化,融合到中国的现实中去,才能使之够成为一种变革现实的力量。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活动,更是一种实践活动。而要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成为实践力量,就必须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使之易于为群众所接受并成为推动群众进行革命的强大力量。所以毛泽东认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sup>[2](P533)</sup>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不仅意

味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和认识中国的现实,使其成为认识现实的科学方法论,同时也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历史,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sup>[2](P534)</sup>出现在人们面前,从而易于为中国人所接受和学习,成为中国人现实实践的主体力量。

这样,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包含了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作为一种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现实,从而产生出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另一个方面是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武装中国人的思想,指导中国人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变革中国现实的力量。通过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改造及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具有了可能性。

### 三

毛泽东不仅从哲学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及其可能性,而且还在实践的过程中总结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即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在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这两条途径中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视野和实践视野,说明了如何形成和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技术性”的问题。

实事求是,简单地讲,就是从实践到理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sup>[3](P802)</sup>也就是说,实事求是无非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从客观存在的事物中、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获得一般性规律的认识这样一个过程。

毛泽东认为,要认识现实就要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收集材料,也就是要搞调查研究。注重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因之一。早在1930年的时候他就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sup>[1](P109)</sup>,“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sup>[1](P115)</sup>。不深入现实和了解现实,在运用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这种人只懂得记住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把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结论机械地套用于中国的现实。这种做法表面上看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却不符合中国的实际,甚至在实践中会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在占有了丰富的实际材料之后,我们又必须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来研究和思考这些现实,从中得出一般性的结论。如果不能从实际中发现一般规律从而形成对于现实的理性认识,则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和教条主义相反。教条主义是从僵化的理

论出发来行动,经验主义则局限于自身的片面经验,而不能了解一般的规律。

实事求是是不是只要一次调查、一次研究就完结了。事实上,从1927年到1945年,毛泽东深入农村做了整整18年的调查研究。正是通过这些调查研究才使得他能够了解农村生活和农民的需要,最终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以,实事求是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过程,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sup>[1](P296)</sup>。这一过程如果概括成为一个公式,就是“实践——理论——实践”的认识论总公式。这一公式也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公式,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公式之一。

要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要坚持实事求是,而且要坚持群众路线。首先,只有在坚持群众路线的基础上才会有真正的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而是一个社会科学进入中国、改造中国现实的过程。对于社会科学来说,社会与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人就是它们所研究的基本对象。所以要实事求是就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的现实生活状况和他们的需要。在这种关系中,群众是作为认识对象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之中的。从对象的角度来研究群众及其需要的时候,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概括为“个别——一般——个别”的方针,即“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sup>[3](P900)</sup>。这里,前一个“个别”是从指导群众的过程中获得经验,即在深入群众的过程中获得各种材料。把这些材料收集起来进行总结分析,形成一般性的意见就是理论。在此基础上就可以用这种理论在更广泛的领域中指导更多的“个别”群众进行实践。所以坚持群众路线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过程,是实事求是的具体化和现实化。

其次,坚持群众路线还是把从实践、从现实中获得的具体理论转化为群众实践力量的过程。群众是实践的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的现实实践,而离开群众的实践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sup>[4](P1319-1320)</sup>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仅仅是从外在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的现实,而是要把这种认识变成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动。群众不仅是社会行动的主体,他们的实践和生活也是社会现实本身。所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sup>[5](P9)</sup>,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旦

为群众所掌握就成为了指导社会实践的力量,理论就由抽象变得具体,变成广泛的现实。

同样,从主体的角度来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化、现实化的过程,毛泽东也作了相应的概括,这就是“群众——领导——群众”的方针。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sup>[3](P899)</sup>与前面所讲的领导方法不同,在这两个环节中,每一个阶段都把群众看作是主体。在从群众到领导的环节中,群众就是意见的所有者,不过这种意见是比较分散的,领导者不过是把这些分散的意见整合起来,系统化和理论化,然后再把这种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意见贯彻到群众中去并转化为群众行动的内在力量。

在群众路线中,把群众作为客体和作为主体看待,并不是相互分离的,两者属于同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毛泽东也是一位极有历史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始终特别强调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sup>[3](P802)</sup>在毛泽东看来,现实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产物,只有了解历史才能够了解现实和变革现实。在历史中,群众显然既是“剧中人”,又是创作者,既是客体又是主体,这就决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了解群众,从群众的实际出发来发现一般性的规律,同时也要把这种发现的结果转化为群众的认识,通过群众的行动来形成一个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指导的、既符合中国现实的发展规律、又符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的现实情况。

实事求是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途径,群众路线不仅是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途径,也是运用和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途径,只有当这两条途径结合起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才能够真正的中国化和现实化。

#### 四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因而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但是作为毛泽东思想赖以产生的方法论前提和基础,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还具有普遍性的品格,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仍然有着指导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相对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时代背景,有

着更为复杂的情况。在毛泽东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主要是用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的革命走向胜利。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方面给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的现实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式,另一方面使中国人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获得一种重新团结起来进行战斗的强大武器。在这种情境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面对的是如何认识现实并且把这种认识变成群众自身的观点从而转变成群众的行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进行的,由于和其他国家处于一种全面的接触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面临着认识中国的现实,也面临着认识当今整个的世界体系并认识中国在整个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不仅存在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也存在着西方思想的中国化以及中国思想的世界化问题。这就使得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有着复杂得多的情形。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有着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是要用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实践,从而推动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始终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而不是教条来学习,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关键就是坚持实事求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多次指出,我们的思想路线“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sup>[6](P62)</sup>“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sup>[6](P272)</sup>总的说来,社会现实是不断变化的,变化了的现实就需要相应变化的理论才能够与之相适应。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想推进中国的变革,要想与中国的现实结合,就必须充分发挥其与时俱进的特征,不断地给自己注入新的血液和新的内容,才能够在不断的现实变革中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任何脱离现实的、坚持某些具体理论永恒不变的观点,都可能会成为现实发展的阻碍,都可能会因为其教条主义性质而变得不合现实。从邓小平理论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以及今天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都是依据中国的现实而提出来的新的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仍然要坚持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群众路线。群众的现实生活 and 他们的需要始终是社会最高的现实。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和现实化,就必须坚持这一路线。无论是三个代表还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显然都是群众路线在新的条件下以新的形式出现。在当今的中国,发展是我们的时代主题。无论是发展的根本动力还是发展的最终目的,都只有以人为本为基础才能够实现出来。所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一方面是群众路线的继承,也是群众路线在新时期的发展。

只有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才能够真正地实现以人为本。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彭介忠)

## Research on Mao Zedong's Theoretical System of Marxist Sinicization

LIU Hai-jiang

(Marxist Department, Guizhou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zhou, Guiyang 550004,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Marxist sinicization is the basis and methodological premise of Mao Zedong Thought. Mao Zedong solves thre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Marxist sinicization: elucidating the necessity of Marxist sinicization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explaining the possibility of Marxist sinicization from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indicating the reality of Marxist sinicization by following mass line an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Mao Zedong's theory of Marxist sinicization still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day.

**Key words:** Mao Zedong; theory of Marxist sinicization; theory; practice

---

(上接第32页)

## On the Historical Subject and Structural Hierarchy of the Natur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WANG Hao-bin

(Marxism Research Institut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The mass people are the creators of history, and also the creators in the naturalization process of Marxism in China. The "realistic people", with mass people as the essential, have formed the historical subjective in the naturalization process of Marxism in China, which internally includes the subjects of historical recognition, historical creation and historical evaluation. There exists a complex relationship among them, representing rich content.

**Key words:** natur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structure of historical subject; historical initiative